

壹、前言

自十九世紀中期以後，馬其頓（Macedonia）這個地域 包括愛琴馬其頓（Aegean Macedonia）、皮林馬其頓（Pirin Macedonia）及瓦達馬其頓（Vardar Macedonia），成為保加利亞（Bulgaria）、塞爾維亞（Serbia）及希臘爭奪之地，因而馬其頓終於成為巴爾幹最複雜、最難處理的問題之一，也平白地給巴爾幹半島增添衝突的激素，直到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瓦達馬其頓成為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之一成員 馬其頓社會主義共和國 後，馬其頓問題之爭端始暫告平息。

一九九一年馬其頓社會主義共和國宣佈脫離南斯拉夫聯邦，成為一獨立的新國家，它未像史洛凡尼亞（Slovenia）、克羅埃西亞（Croatia）及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Bosnia-Herzegovina）一樣，與南斯拉夫聯盟（The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 FRY；簡稱南聯盟）發生戰爭（按：南聯盟係由 Serbia 和 Montenegro 共組成，自稱延續前南斯拉夫聯邦，故被稱 the rump-Yugoslavia。南聯盟幾乎由塞爾維亞主導內、外政策，所以習慣上以塞爾維亞代表南聯盟。不過，南斯拉夫聯盟將於二 六年廢除不再使用，國名改由「塞爾維亞-蒙特內哥羅」取代之）。馬其頓的獨立雖然逃過「獨立戰爭」的浩劫，可是這個新獨立的國家，因以「馬其頓共和國」（Republic of Macedonia）的國名而獨立，由於這個國號產生了許許多多的問題：這個國家的認同，它的國名、徽記、言語及歷史等，變成了它與鄰國 塞爾維亞、希臘、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Albania）

之間爭議的問題，頗富饒趣。例如在希臘均對他們北鄰的新國使用「馬其頓」這個字作為國號的正當性及合法性予以否定，也對馬其頓這個民族、它的言語及歷史之存在予以否定；保加利亞則接受「馬其頓」這個字是一合法性的歷史、地理名稱，也接受以「馬其頓」作為國家的名稱，但卻拒絕承認馬其頓民族及其語言的存在；塞爾維亞則懷疑有任何斯拉夫人會去認同今天的馬其頓是一民族。不過，馬其頓人則認定他們的民族、語言，自古代的馬其頓帝國以來就已存在。這些辯論，各國各就自己有利的立場向外在的世界宣示。總之，一九九一年馬其頓共和國的獨立，再度掀起了馬其頓與其鄰國之間有關民族、歷史、語言、地理 之爭議，並牽涉到馬其頓共和國之承認問題而引起國際社會 歐洲共同體（歐洲聯盟）及聯合國 的介入，最後連美國也介入調停。因此，馬其頓建國初期，其與鄰國之關係發展也頗曲折有趣。

貳、爭端的歷史背景

當斯拉夫人 (Slavs) 於第六世紀末移居到馬其頓時，發現該地域早有講希臘語的馬其頓人存在。在此之前，除西元前三三六年，亞歷山大大帝 (Great Alexander) 建立馬其頓帝國外，馬其頓從西元前九世紀到西元第二世紀，這一千一百年間完全在希臘勢力所統治，至西元前一四六年前受羅馬帝國所管治，第四世紀起則由拜占庭 (Byzantine, 按：即東羅馬帝國) 統治 (成林、周健，1994：12)。

保加利亞人 (Bulgars/Bulgarians) 隨斯拉夫人之後，於第七世紀移居巴爾幹，不久展開反抗拜占庭。大約在第九世紀後半期，保加利亞人波瑞斯沙皇 (Tsar Boris) 侵佔除愛琴海 (Aegean Sea) 沿岸外的整個馬其頓。第十世紀後半葉，在短暫回歸拜占庭統治之後，珊繆爾沙皇 (Tsar Samuël) 又建立了包括馬其頓在內的保加利亞大帝國，建都於歐赫瑞德 (Ochrid)。珊繆爾沙皇死後，又由拜占庭所統治。如是，馬其頓或部份馬其頓，由保加利亞或拜占庭交替統治，直到十三、十四世紀，則由塞爾維亞沙皇所統治，其中最偉大的沙皇是杜夏 (Stephan Dushan)，他在斯科普耶 (Skopje) 建都，以現在的科索沃 (Kosovo) 為中心，建位塞爾維亞大帝國，其轄區擴大至希臘。杜夏死後，塞爾維亞帝國也隨之而亡；這時的土耳其人已開始入侵巴爾幹，到一三七一年，馬其頓被土耳其統治 (成林、周健，1994：12；Georgeritch, 1978, chap. III)。

一四五九年土耳其人撤除塞爾維亞東正教總主教，將教會的行政改由保加利亞的歐赫瑞德總主教負責，一五五七年塞爾維亞總主教在伊北克 (Ipek) 復位，到一七六六年再度被撤除，一七七七年土耳其人終止了歐赫瑞德總主教的獨立自主教會，將斯拉夫人的兩個教會——馬其頓 / 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改由希臘總主教治理。從這個時候起到一八七一年，希臘神職人員擁有對馬其頓信奉東正教者精神上的控制權 (Georgevitch, 1978, chap.)。由這段史實得知，自紀元前三世紀至十九世紀止，這二千二百多年的馬其頓地域分別由羅馬、拜占庭、希臘、保加利亞、土耳其、塞爾維亞等帝國分別輪替統治，未曾建立過自己的國家，因此，希、保、塞皆不承認有馬其頓民族之存在。

從第九世紀起至十九世紀，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及希臘之間的民族教會 (national-ecclesiastical) 爭執達近十個世紀，土耳其鄂圖曼帝國 (the Ottoman Empire)

就他們之間的對立技巧地加以利用，一八七一年土耳其將國家區域教區「地方化」，創建了保加利亞總主教轄區（Bulgarian Exatchate），降低它的位階，將過去教會的自治自主置於帝國管轄之下。巴爾幹的人民，因長期受到鄂圖曼帝國及奧、匈帝國所統治，教會成人民生活中心地。於是教會負起保存斯拉夫文化及民族屬性的重責。教會遂成為民族解放運動革命者的活動場所，於是整個十九世紀，巴爾幹地區的民族主義特色逐漸增強，塞爾維亞、希臘和保加利亞透過民族主義之醒覺開始反抗土耳其，這時「馬其頓內部革命組織」也加入保加利亞反抗土耳其運動，在起義事件中扮演著相當重要角色。那時候的強權英、法、普、奧，一方面希望鄂圖曼帝國的瓦解，一方面又恐懼鄂圖曼帝國的瓦解，希望其瓦解，則可瓜分土耳其在巴爾幹的遺產，可是在一八七一年左右，俄羅斯帝國已計劃選定保加利亞做為其擴張巴爾幹勢力的最佳通道或踏板後，歐洲列強開始注意巴爾幹之情勢發展，因而恐懼鄂圖曼瓦解後，少了阻擋俄國勢力擴張的阻力。馬其頓是俄國經保加利亞貫穿巴爾幹的通道，俄國對馬其頓志在必得，終於開啟了馬其頓的爭端（Georgevitch, 1978, chap. ）。

馬其頓的爭端，是因一八七七年一八七八年的俄、土戰爭，土耳其戰敗，簽訂了聖斯特法諾條（the Treaty of San Stefano）所造成。這項條約是俄羅斯在土耳其身上強取戰利，此條約同意俄國之方案：在色雷斯（Thrace）以西的巴爾幹建立「大保加利亞」（the Greater Bulgaria）國家，其疆土為北起多腦河，南至愛琴海，東臨黑海，西抵亞德利亞海（Adriatic Sea），即整個馬其頓、塞爾維亞東南部和阿爾巴尼亞一小部份地區都納入保加利亞的版圖，此即所謂的聖斯特法諾保加利亞。因歐洲列強的反對，乃於三個月後（一八七八年六月一日至七月一日），英、法、奧匈、普、義、俄在柏林開會，推翻聖斯特法諾條約，通過著名的「柏林條約」（the Treaty of Berlin），條約規定大保加利亞降為保加利亞大公國，馬其頓的主權依舊屬於土耳其（馬細譜，1997：7-12）。柏林條約滿足了歐洲列強並削弱俄羅斯在巴爾幹地區的勢力和影響力，更顯示了它們在解決鄂圖曼帝國遺產和主宰巴爾幹小國命運中，是以瓜分的方式來處理巴爾幹，激發了巴爾幹民族主義瘋狂地崛起反抗。

一八九五年，在保加利亞首府索非亞（Sofia）流亡的馬其頓人，成立了「最高委員會」（Supreme Committee），其目的在為解放馬其頓（按：其所謂的馬其頓包括 Pirin Macedonia, Vardar Macedonia 及 Aegean Macedonia 三部份領土）而奮鬥；翌年，兩位馬

其頓民族主義意識堅強教師葛魯夫（Damian Gruev）及德契夫（Gotse Delchev）領導成立「馬其頓內部革命組織」（the Internal Macedonia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IMRO）⁽¹⁾。

最初，「馬其頓內部革命組織」，是一秘密地下組織，其主要的工作是：組織並武裝馬其頓人民，而其組織本身也是一影子政府（shadow administration）。一九〇三年八月，該組織在馬其頓首次公開起義，攻擊土耳其駐軍及官員。最後，遭到土耳其殘暴鎮壓而失敗（Bazhdaroff, 1926: 13）。

一九〇八年十月，保加利亞斐迪南國王（King Ferdinand），在與奧匈帝國協議下，宣佈保加利亞完全獨立，奧匈帝國卻兼併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塞爾維亞為此大為不滿。這時大國在巴爾幹的關係變成十分緊張，但是，雖然由於俄國的節制，未爆發戰爭，但是危機造成的結果，使塞爾維亞欲藉聯俄抗奧，及保加利亞各欲重建大國的美夢，兩國各以不同的理由投入俄羅斯懷抱（Barker, 2001: 10-11）。

一九一二年發生一奇特的事，巴爾幹的三個小強權——希臘、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彼此擯棄對馬其頓的異議，糾合蒙特內哥羅（Montenegro，又稱黑山）締結成聯盟，目的有二：一則抗拒大國維持現狀之利益不變，一則欲將土耳其人趕出馬其頓。促成四國結成聯盟之因素有：（一）俄羅斯成功地調和了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二）希臘出了一位有企圖心的總理凡尼塞羅斯（Venezelos）。令人震驚的是一九一二年三月三日簽署了瓜分馬其頓的塞-保協議（Serbo-Bulgarian Agreement），根據協議所附之密件：保加利亞將取得羅多彼（Rhodope）山脈及斯特魯馬（Struma）河以東所有的領土；而塞爾維亞將佔有夏爾（Shar）山脈以西及以北所有土地。雙方對爭議地區，同意由西南至東北劃條線——起自歐赫瑞德（Ochrid）湖經斯科普耶（Skopje）及維雷斯（Veles）之間到庫斯滕地爾（Kustendil）北端，塞爾維亞保證不向此線之東南提出訴求，雙方有其他爭議時，由俄皇仲裁（馬細譜，1999：16）。五月二十九日簽訂希-保條約（the Greek-Bulgarian Treaty），此條約沒有領土的分處規定，所以希臘對馬其頓領土之擁有權未被確定，它僅是一共同軍事防禦盟約；九月黑山分別與塞、保、希三國締結同盟或口頭協議，於是反土耳其的巴爾幹聯盟終於形成。有趣的是：塞、保、希三國雖結盟反土耳其，可是對未來馬其頓一旦自土耳其解放出來，是否該讓其自治或獨立並未曾作明確的表示。探索其原因，蓋因它們三國為其本身的權力，在馬其頓境內各自在文化、教會及武裝上有自己經營的武力，造成它們三

國均認定：不可能會有另一股外力願意援助馬其頓自土耳其手中解放出來而令其獨立，因此他們三國各自盤算如何瓜分馬其頓。

第一次巴爾幹戰爭於一九一二年十月十八日爆發，巴爾幹四國聯盟同時起義反抗土耳其，各國將重點兵力指向各自想要奪取之地區，黑山攻佔阿爾巴尼亞北部，保加利亞軍隊攻東色雷斯，塞爾維亞軍隊出擊馬其頓北部，希臘攻取馬其頓南部，不到一個月，土軍崩潰，乃不得不請列強調停。歐洲英法大國擔心巴爾幹聯軍奪取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失去自己在博斯普魯斯（Bosporus）及達達尼爾（Dardanells）兩海峽之戰略地位，遂出面斡旋。巴爾幹聯盟與土耳其雙方經五個月的談判，最後於一九一三年五月三十日簽訂倫敦和約。談判中奧、義不願見塞爾維亞的國土瀕臨亞德里亞海，乃主張建立阿爾巴尼亞為獨立國，作為緩衝地帶，於是塞國轉而要求修改與保加利亞之密約，欲從馬其頓中求取更多補償；希臘不願自住隨多數希臘人的北伊庇魯斯（North Epirus）地區撤軍，同時希望能多分佔些馬其頓和色雷斯，並堅決反對保加利亞對薩隆尼卡（Salonika，即今希臘的 Thessaloniki 港）及周圍領土之要求；黑山站在塞、希同一陣線，也不願自阿爾巴尼亞北部撤軍；保加利亞認為馬其頓的居民大都為保加利亞人，它應佔有斯科普耶和薩隆尼克，甚至獨佔整個馬其頓，因此將軍隊開進保、希邊境的斯特魯馬山谷（Struma Valley），絕不向塞、希作土地的讓步，塞、希共同面臨保加利亞的壓力，立即於一九一三年六月一日結為同盟。保加利亞國王斐迪南見此情勢，採先下手為強之襲擊策略，六月七日乃下令向駐在馬其頓之塞、希軍隊突襲，掀起同室干戈的第二次巴爾幹戰爭。

黑山、羅馬尼亞（Romania）乘虛向保加利亞宣戰，土耳其捲土重來出兵東色雷斯。結果，短短一個月，保加利亞背復受敵，危在旦夕，被追求和，於八月在羅馬尼亞首都，簽訂布加勒斯特條約（the Treaty of Bucharest），除賠款外，條約規定：希臘得愛琴馬其頓（Aegean Macedonia），其面積略超過半個馬其頓，保加利亞僅保有皮林馬其頓（Pirin Macedonia），面積佔 10%，塞爾維亞佔有瓦達馬其頓（Vardar Macedonia，即今之馬其頓共和國）。

無可避免的，布加勒斯特條約不僅對保加利亞政府及人民是一大打擊，同時對馬其頓「最高委員會」及「馬其頓內部革命組織」的成員也是一大打擊，因為它們的成員為求馬其頓的自治或獨立而加入保加利亞軍隊中作戰。結果，保加利亞除保有馬其頓邊緣

之東斯特魯馬山谷及上梅斯塔（Mesta）山谷外，喪失了整個馬其頓，馬其頓雖自土耳其手中解放出來，卻又被希、塞所佔領，既無法自治更不能獨立，「馬其頓內部革命組織」極度不滿與義憤。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協約國（the Entente）與同盟國（the Alliance）兩大陣容對抗，保加利亞加入能保證它取回馬其頓最大利益的同盟國這一邊，因為協約國已與塞爾維亞結盟，自無法提供或滿足保加利亞的利益，於是加入以德國為主的中歐強權集團。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馬其頓被希臘（34,600 平方公里）、塞爾維亞（26,776 平方公里）、保加利亞（6,798 平方公里）三國所瓜分，保加利亞僅得 10% 的馬其頓領土，「馬其頓內部革命組織」的成員極為失望，因為他們原欲借助保加利亞之協助而自治國獨立。在這種情況下，保加利亞遂成為馬其頓恐怖主義活動的大本營。「馬其頓內部革命組織」強烈反對瓜分，其主要對抗的戰場在塞爾維亞，甚少去惹希臘，他們甚至在二次大戰期間與克羅埃西亞烏斯塔夏斯（Croatian Ustashes；按：為第二次大戰時，德國佔領巴爾幹時的克羅埃西亞傀儡政府的恐怖組織，專屠殺塞爾維亞人）合作，對抗塞爾維亞（謝福助，1995：834-847）。一九三〇年代，「馬其頓內部革命組織」內傾向獨立的左派，宣示明確的馬其頓民族意識，企圖統一被瓜分的三個領土合而為獨立的馬其頓國家；塞爾維亞（南斯拉夫）共產黨也於二次大戰中鼓吹大戰結束後應建立一馬其頓制憲共和國，成為單一民族的民族國家。可是戰爭結束，南斯拉夫共產黨高層對有關馬其頓建國問題，卻把「馬其頓民族問題最後解決」（the Final Settlement of the Macedonian National Question）明列在南斯拉夫共產黨的聲明中（Reuter, 2001: 30），成為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內之一邦。

在第二次大戰期間，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希臘對有關馬其頓之爭執仍有論戰，不過我們可以說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九〇年的四十年間，馬其頓問題被「凍結」，因南斯拉夫聯邦的存在，使得希、保不敢窺伺或攻佔馬其頓，也阻止了瓦達馬其頓潛在的民族主義浮現擴大。

當馬其頓見到南斯拉夫聯邦將解體之際，被壓抑已久的馬其頓民族主義再度復燃。一九九〇年起，馬其頓人民不願再遵守貝爾格勒（Belgrade）的法統所統治，開始從事民族獨立運動；並在史洛凡尼亞、克羅埃西亞宣布獨立後，也隨之宣佈獨立，同時為表示與鄰國和睦相處，並尋求鄰國之支持與承認，乃以一九九二年一月六日修憲來表明其

對外基本政策：

第一條第一款：馬其頓共和國無向鄰國領土主張之要求。

第二條：馬其頓共和國 不干涉他國之主權或它們之內政。

馬其頓共和國獨立初期，雖然在憲法上表明無對外要求領土擴張之主張，也尊重鄰國之主權與內政，可是馬其頓擔心的不只是其國內的經濟與種族問題，同時也存在著對鄰國的恐懼，因為過去曾經瓜分它的希臘、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塞爾維亞，仍圍繞在這個國家，此外，還面臨國家承認的問題。

希臘要求霸佔使用「馬其頓」這個名字，公然抨擊馬其頓共和國利用此名字作為國號，顯然有向希臘北部的馬其頓省招手回歸之企圖，連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簡稱歐體；一九九二年以 European Union 取代之）也多少受雅典政府之影響；阿爾巴尼亞與馬其頓維持外交關係，但是兩國的關係，卻因馬其頓內部的阿爾巴尼亞少數民族問題，雙方一直弄得非常棘手複雜；保加利亞在外交上承認馬其頓，但一直存有不承認「馬其頓民族的存在」爭端；塞爾維亞官方不曾表示對馬其頓領土提出訴求，可是一些極端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如激進黨（Radical Party）領袖塞塞里（Vojislav Seselj）曾公開主張由四個鄰國瓜分馬其頓（Barker, 2001: 8）。今分別就塞爾維亞、希臘、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對馬其頓獨立初期之反應略作敘述與分析。

？、南斯拉夫聯盟 / 塞爾維亞

馬其頓與鄰國的關係中，最重要的是與希臘及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 / 塞爾維亞的關係，理由是希臘反對以「馬其頓」為共和國國號，阻延了馬其頓國際地位的完全正常化；南聯盟 / 塞爾維亞則因為繼承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其與馬其頓的關係由兄弟之邦轉成鄰國關係，因而有馬其頓必須解決所有過去南斯拉夫憲法及國籍問題；此外，南聯盟 / 塞爾維亞本身在科索沃（Kosovo）戰爭爆發之前，又有國際地位承認問題的存在，因南聯盟 / 塞爾維亞未普遍受國際社會所接受或承認，特別是不受美國的承認。

馬其頓獨立之初期，其與南聯盟的關係，幾乎完全受制於前南斯拉夫境內危機及內戰的影響。因此，馬其頓的獨立與南聯盟之關係，在前南斯拉夫危機的過程中，

與其他共和國的獨立與南聯關係不同。在前南斯拉夫諸共和國中，馬其頓為一最貧窮的國家，由於經濟脆弱，一直得仰仗其他共和國及南斯拉夫的市場。因此，獨立對馬其頓而言乃是一大風險；再說馬其頓為一多民族共和國，建國的歷史才五十年不到，而且是在前南斯拉夫同意下才建立了一聯邦內的共和國，如今脫離前南斯拉夫聯邦而獨立，竟然未發生塞爾維亞鎮壓戰爭，這是因為塞爾維亞與克羅埃西亞之戰事已起，波士尼種族衝突緊張情勢升高，無力為馬其頓獨立另闢戰場，馬其頓運用有利的情勢，在夾縫中求取獨立。

塞爾維亞與馬其頓的關係，與其他聯邦內的共和國不同，主要在於歷史因素。吾人應記得前面所述，在巴爾幹戰爭（1912-1913）反抗土耳其之後，塞爾維亞依據布加勒斯特條約取得瓦達馬其頓（Vardar Macedonia）的司法管轄權（馬細譜，1999：19），也就是實際取得馬其頓的統治權（主權仍屬於顎圖曼土耳其）。因此得知，在地理上、政治上現在的馬其頓（即 Vardar Macedonia）被視為「南塞爾維亞」（Southern Serbia），可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變成前南斯拉夫聯邦內的單獨行政實體。由此，一個獨立的馬其頓民族之存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為狄托所領導的共產黨所承認，戰後只因馬其頓人民浸在民族解放及第二次世界戰爭勝利的氣氛中，加上南共聯盟的壓力，馬其頓人民為未強烈提出民族存在的問題。大體上，塞爾維亞（應說成前南斯拉夫）未取消馬其頓的選擇權（option）：馬其頓雖一方面為塞爾維亞民族實體的一部份，可是另一方面，馬其頓卻使用其自身的語言，沒有受到塞爾維亞的強制同化，塞爾維亞民族內的馬其頓人在自然就建立了藩籬。

當馬其頓決定向歐洲共同體巴丁特仲裁委員會（the European Community's Badinter Arbitration Commission）提出獨立國際承認訴求時，塞爾維亞頗感意外。那時前南斯拉夫內部早已存在著緊張的情勢：史洛凡尼亞、克羅埃西亞正尋求獨立。因此，馬其頓的動機，被塞爾維亞看成分離主義之舉。事實上，塞爾維亞／南聯盟對每一共和國要求分離獨立，在政治及情感上的感受上，都視它們為一種反叛，對共同歷史成就的背叛，對造就南斯拉夫聯邦這個國家的先烈之犧牲的背叛，對塞爾維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南斯拉夫民族所做一切的背叛（Barker, 2001: 9）。

不過，馬其頓的獨立承認，並未造成流血戰爭，此乃拜「情勢」之賜，前已述及，在馬其頓提出獨立承認之際，塞爾維亞正忙於克羅埃西亞戰爭，無力兩面作戰，只有對

馬其頓採安撫之策；一九九二年五月，聯合國對南聯盟／塞爾維亞實施經濟制裁，到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制裁終止為止，在這段制裁期間，塞、馬雙方產生特殊關係；因為塞爾維亞可透過馬其頓輸入經濟必需品，以減輕經濟制裁的壓力，當然這種非法貿易對馬其頓的經濟也有相對的利益或好處。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簽署戴頓協定（Dayton Agreement）後⁽²⁾，馬其頓在建立對外關係的立足上，才有一條更寬闊的道路。一九九六年四月，馬其頓與南聯盟建立了外交關係，增強了兩國間的接觸，開啟了雙方的新前景。

在一九九六年四月塞爾維亞／南聯盟承認馬其頓獨立之前，雙方的關係，事實上曾有些緊張或摩擦，首先，緊張的信號是發生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因為數十年來，塞、馬雙方共同慶祝反抗土耳其佔領的巴爾幹戰爭（1912-1913）周年慶上，只歌頌塞爾維亞軍隊的功績或戰績，馬其頓認為這等於是塞爾維亞取代了土耳其鄂圖曼，將馬其頓成為塞爾維亞的一部份，乃對塞爾維亞發出不滿的聲音（Drezov, 2001: 53）。

前南斯拉夫與史洛凡尼亞、克羅埃西亞之衝突危機初期，馬其頓並未對獨立與主權作太大的堅持，馬其頓領導階層贊同從地方分權、鬆弛聯邦或邦聯中作選擇，卻遭到塞爾維亞厲嚴的反對。前南斯拉夫六共和國領袖會議上，馬其頓總統格里哥羅夫（Kiro Gligorov）建議共同找出折衷方法來調和諸共和國不同的地位，卻沒有結果。一九一一年一月，馬其頓國會在索布萊尼耶（Sobranie）通過獨立宣言及綱領（Platform），並分析南斯拉夫內部未來的政治秩序，是年五月，獨立的決定已趨明顯：如果史洛凡尼亞、克羅埃西亞主權獨立，馬其頓也跟進（Frase, 1993: 7-10）。

格里哥羅夫與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的總統伊塞伯哥維奇（Alija Izetbegovic, 按：危機初期，他也不堅持獨立），於一九九一年六月共同提出維持南斯拉夫聯邦存在的原則文件：以改變政治體制作為維持聯邦的條件，但被其他共和國所拒。在危機初期，這兩位領袖之努力，據有些政治分析家認為並非真意，其政治活動乃陰謀脫離南斯拉夫聯邦而獨立（Frase, 1993: 7-10）。其實這兩位領袖早在一九九〇年一月第十四屆南共聯盟代表大會失敗後曾表示：即使史洛凡尼亞、克羅埃西亞脫離聯邦而獨立，也願留在聯邦內。但從現實的理由來看，波士尼亞是一民族混雜區，塞族人佔相當大的一部份（31%），顯然不願脫離塞爾維亞而獨立，再說穆斯林從未有自己的國家，獨立意識也不強；馬其頓也是一民族混雜區，馬其頓人雖為國家的主體民族，但它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始被承認的年輕民族，加上經濟極度落後，長期依賴南斯拉夫，如獨立則

遠景黯淡，不敢貿然進行（Frase, 1993: 7-10）。

因為塞爾維亞拒絕接受其他共和國所提之妥協建議方案，促成波士尼亞和馬其頓決定加入史洛凡尼亞、克羅埃西亞的行列，共同走向獨立。今根據一九九一年以後的事件發展來看，塞爾維亞做了一項嚴重的錯誤：未協助這兩個共和國，讓它們安心地留在一個共同的聯邦國家之內。如由四個共和國——塞爾維亞、蒙特內哥羅、波士尼亞、馬其頓組成國家，不難看出，這對塞爾維亞具有極大的利益，走出二共和國後的新聯邦，塞爾維亞仍居內政外交主導優勢地位。

馬其頓獨立之初，在一九九三年申請加入聯合國之前，因受希臘之影響而未受到重要國家之承認，國際組織也不同意入會，使得原本貧困的馬其頓遭到不利的經濟影響，主因是無法接近求取國際政財之支持或援助（Perry, 1992: 12-19）。塞爾維亞媒體新聞常常渲染如馬其頓的獨立，將使馬其頓人民陷入生存艱困的夢魘，馬國雖決心強渡難關，卻不易克服，塞爾維亞不僅見死不救，更落井下石，雙方關係到底谷，這歸因於外部因素：即塞爾維亞欲造成巴爾幹區域的不穩定，削弱各國及各民族的力量，以便支配並控制此地區的國家。這個時候，馬國內有些主張併入保加利亞的政治人物群起譴責，反對馬其頓獨立（Krapfl, 1996: 297; Naum, 1997: 100）。塞爾維亞著名民族主義領袖之一的塞塞里更堅決反對馬其頓獨立，聲稱塞爾維亞對馬其頓這塊土地擁有「歷史權利」(historical right)，在塞爾維亞國會上非常強烈堅持他的主張，甚至揚言只要派兩個陸軍師就可以佔領馬其頓。在此內外反對抨擊之際，聯合國宣布制裁南斯拉夫，馬其頓成了南國的「安全瓣」(safety valve)——馬其頓成為為塞爾維亞抒困的秘密管道。儘管雙方媒體相互攻訐，但前南斯拉夫內有戰亂，外有國際社會壓力，兩國領導人為國家利益，乃呼籲降低或緩和雙方不愉快關係（Krapfl, 1996: 297; Naum, 1997: 101）。

塞爾維亞另一項善意的動作，頗令馬其頓上下深為感激的是當時塞爾維亞與克羅埃西亞之戰爭持續進行著，而且可能與波士尼亞交戰，加上塞國民族主義極為高漲，就在這時塞爾維亞竟然將人民軍自馬其頓撤出，只帶走人與軍械，其他的則完整留給馬其頓，這意味著前南斯拉夫聯邦放棄共同資產，讓馬其頓完全取得資產的權利，這等於為馬國之財政、國防挹注一大助益。事後觀之，這是塞爾維亞一明智導向：（一）避開了兩面或三面作戰的危險；（二）調整了後來馬其頓防禦概念的建立，這種概念絕

然不同於巴爾幹其他國家所採取的盡其所能擴充人員、軍備，因為馬國的歲收與國家經濟無法像其他國家一樣有供養軍事的能力。因此，馬國將自己導向「解除軍備」(demilitarisation)及「以弱軍保護自己」(protecting itself by military weakness)策略上(Isakovic, 1996: 1-11)。事實上，馬其頓總統格里哥羅夫在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五日接受《Nasa Borba》日報的訪問時表示：馬其頓是一緩衝區，可為區域平衡的槓桿，並借助外力如歐盟、北約來保護自己，認為集體安全是馬其頓國家安全最好的防衛基礎與保障。

最後南聯盟與馬其頓於一九九六年四月簽署正常化關係，何以雙方關係正常化會拖這麼久？是雙方無法在政治上、法律上各取得它們之所需？是因希臘與馬其頓之間為國名之爭執？還是因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國間某些事務未解決？

事後觀察，戴頓協定多少有點為它們之間帶來強制正常化的助力，加上南斯拉夫聯盟最優先之政策獲取滿足，終於促成雙方自然之發展。

的確，戴頓協定之條款提供了南聯盟的決定，而馬其頓同時也表示願意與鄰國正常化；塞爾維亞之遲疑承認馬其頓，其實是深怕因與馬其頓交好而傷害到與希臘的良好關係，因為希臘是南斯拉夫危機的幾年中，被南斯拉夫聯盟認定是唯一的真實盟友。希臘因在國號方面已與馬其頓正常化隨了磨擦，南聯盟如先與馬其頓正常化，則在希臘方面會視為負面的感受，希臘會視為被塞爾維亞所出賣，這對南聯盟想與歐體/盟會員國正常化及欲躋進歐體/盟不僅無所助益，反而成了障礙。

馬其頓承認南聯盟是一九一八年以來前南斯拉夫的延續國，這是南聯盟官方國際政策及外交政策最高的優先權，而南聯盟承認以「馬其頓」為國號的共和國，是一九四四年以來前馬其頓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延續國，雙方最重要的成就是它們與前南斯拉夫聯邦各共和國之關係建立，塞爾維亞此舉卻也令希臘震驚，因為塞爾維亞過去不惜預戰爭來阻止它們脫離聯邦，不過歐體/盟的其他會員國，卻視南聯盟此舉實為巴爾幹的情勢穩定做出了一大貢獻(Marinkovic, 1996)。

馬其頓與南聯盟正常化協定，開展了兩國關係之新紀元，使得未來經濟合作之安排及其他事務之合作更加容易，特別在經濟上它們是互補的關係，到二〇〇二年為止，塞爾維亞是馬其頓最主要的經貿夥伴，47%之外匯來自塞爾維亞(Bogoer & Uzunov, 1996: 63-113; 蔡佳芳, 2001: 41-44)。實際上，南聯盟與馬其頓之關係建立似乎沒有什麼爭

執，邊界問題也已於二〇〇一年二月二十三日簽署劃分協定（蔡佳芳，2001：19），馬其頓境內塞族人地位，因僅佔馬國人口 2.1%，爭執也不大，由國內法規規定予以保護；至於繼承問題由國際會議來處理。所有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國於會議中提出它們的立場，共同解決，也不是大問題（蔡佳芳，2001：19；Dzunor, 1994: 199-230），而目前南聯盟與馬其頓雙方均在經濟重建上尋求發展，關係極為良好。

肆、希臘

前蘇聯與東、中歐之瓦解，結束了與美國長達四十年的兩極對抗體系，西方一片歡欣、喝采，開創了全歐經濟繁榮、民主自由的新紀元。就單一超級強權的美國來說，這種情勢提供了美國塑造新世界秩序的挑戰願景；同樣地，歐洲共同體／歐洲聯盟也受到鼓舞，重懷大志，扮演推進歐洲新秩序到整個舊歐洲大陸的挑戰角色，即所謂的歐體／盟東擴。

不幸的是在巴爾幹，在追求「歐洲美夢」（European Dream）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或十九世紀時的傳統「大民族」（greater nation）——大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大保加利亞主義、大阿爾巴尼亞主義、大馬其頓主義——願景的復活之間的矛盾、衝突，把巴爾幹半島北部——前南斯拉夫聯邦——撕得支離破碎，導致聯邦內種族間的武裝衝突，希臘北境的鄰國——南斯拉夫聯邦，潛在危機成鏈狀般地呈現在現在的政治版圖上。就希臘來說，往長期觀點看，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希臘東翼的情勢發展，已令希臘隱隱約約感到不安，因土耳其前總統奧薩爾（Turgut Ozal）培植下的政治菁英，在前蘇聯瓦解發展的刺激下，強力主張建立強大軍事，開始有恢復「鄂圖曼光榮」的聲音出現，造成希臘深慮不安，因為安卡拉（Ankara）的民族主義者已將「伊斯蘭建構」（Islamic arch）的意識推伸到巴爾幹，這對希臘而言是不佳的徵兆，何況各種民族主義聲音正於此時響徹巴爾幹（Alexandris, 1994: 850; Kyrkos, 1993: 28-29; Criic, 1991）；其次，希臘決策層關心著南聯盟／塞爾維亞內部最嚴重的科索沃問題，它可能掀起前馬其頓社會主義共和國（Socialist Republic of Macedonia, SRM）境內阿爾巴尼亞居民地區陷入流血鬥爭中，影響馬其頓難民湧入希臘北部馬其頓省或造成與阿爾巴尼亞交界的騷動，把希臘與阿爾巴尼亞的惡劣關係推到沸點：由於希臘關注阿爾巴尼亞南部的北伊庇魯斯問題——該地區住有 60% 希

臘人，卻劃歸給阿爾巴尼亞統治（馬細譜，1999：159-165），希臘極為關懷此地區希臘人的權利與地位，因他們長期受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獨裁者赫克薩（Enver Hoxha）政權之壓迫（馬細譜，1999：159-165）。最後是馬其頓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新地位與未來發展，希臘恐懼大馬其頓民族主義引發希臘北部馬其頓省的骨牌效應。

歐體／盟所有會員中，目前只有希臘一個會員國位居東南歐，且屬於波濤洶湧動亂的巴爾幹地區之外圍，也是歐體／盟唯一可能直接、間接涉入此危機潛在地區的會員國。很諷刺的是長期冷戰期間，希臘一直處在東西對抗線上西方的前哨站，具有高度地緣政治之戰略價值，受北約及美國的核子傘保護著。然而蘇聯集團瓦解，威脅降低，希臘以前那種地緣戰略價值也隨之下降（Veremis, 1995: 72）；可是，西方認定希臘為歐體／盟及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CSCE；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改為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的會員國，擁有強勢經濟力與民主政治制度，對巴爾幹地區具有潛在穩定因素，所以歐體／盟及華盛頓當局均期望雅典政府能肩負起穩定巴爾幹的角色（Valinakis, 1994: 128; Wallden, 1994: 14）。

回溯歷史，傳統上希臘的威脅來自北方，二十世紀就有三次創傷的經驗：第一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希臘馬其頓及色雷斯被保加利亞所佔領，且由強權德國所保護；第三次是希臘內戰（1946-1949），希臘共產黨與北方共產鄰國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通氣，在蘇聯支持下欲奪回希臘馬其頓與色雷斯，甚至欲奪希臘政權（Kofos, 1993: 336）。

因為希臘有來自北方的痛苦經驗，未來巴爾幹各國新民族主義可能會配合安哥拉所建立的民族主義作基礎而結成聯盟，如是，恐怖主義的幽靈會不斷在希臘出現。有此認知，一九九〇—一九九二年前南斯拉夫危機初期，希臘與其宿敵保加利亞維持極為良好的關係，這是自拜占庭以來獨有的特先例，目的在先求北方支柱之穩定，再借歐體／盟與北約對保加利亞之約束（Kofos, 1991: 97-122）；同樣地，希臘繼續與南斯拉夫維持三十多年的良好關係，即使爆發出馬其頓問題，它們之間的關係依然不變。一九八〇年代，希臘與阿爾巴尼亞之關係，由於一九八七年希臘首先表示取消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宣佈對阿爾巴尼亞的戰爭狀態，終止了兩國為戰爭國家（state of war）之合法架構，降低了北伊庇魯斯問題之爭執，雙方關係顯著改善。在這種氣氛中，希臘對傳統「威脅來自北方」的防備幾乎已解除了武裝（Kofos, 1991: 97-122）。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於歐洲各國領土爭執問題，於一九七五年赫爾辛基最後議定書（Helsinki: The Final Act）的和平共存（peaceful coexistence）精神下，北美與歐洲國家遵守維持歐洲戰後領土現狀的契約義務。可是馬其頓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斯科普耶政府，不斷出現譴責希臘不承認其境內的馬其頓人為少數民族，以及不許他們返回馬其頓，這些舉動被希臘政府看成是南斯拉夫聯邦的馬其頓共和國努力再度喚醒收復失地主義（revanchist）及民族統一主義（irredentist）的訴求，破壞赫爾辛基議定書的協議。馬其頓社會主義共和國除了將意識型態轉化成馬其頓民族主義之外，同時也向世界宣告：講斯拉夫語的希臘馬其頓人和保加利亞馬其頓人都是古代四千年前亞歷山大大帝血統的後裔，以此冀求以「馬其頓主義」來求取國際承認馬其頓民族，希臘政府對馬其頓此一訴求的政策，根本一直就否定馬其頓民族存在的說法（Papatthemelis, 1990: 43）。

狄托（Josip B. Tito）死後，自一九八〇年代中期起，斯科普耶成為反希臘的宣傳中心，南斯拉夫聯邦瓦解，馬其頓社會主義共和國於一九九一年九月改國號為「馬其頓共和國」而獨立，希臘政府及學術界、政治界、媒體乃至國際法學家極嚴肅看待此問題，舉國上下反「馬其頓主義」形成單一的共識，由靜態、被動的歷史述說——古代馬其頓人是泛希臘人的一部份，菲力浦大帝（King Philip, the Great）所建立之馬其頓帝國，其領土與泛希臘相吻合，改成動態、主動的戰鬥口號（battle cry）：「馬其頓是希臘的」（Macedonia is Greek）。這才使一般西方人認知馬其頓這個名字，除古代馬其頓外，還有南斯拉夫馬其頓共和國及希臘馬其頓。希臘在塞薩隆尼基（Thessaloniki）及其他城鎮發動示威遊行，特別是一九九二年二月十四日塞薩隆尼基百萬人示威遊行，這些希臘民族主義者的動機，想乘巴爾幹混亂情勢中對北鄰馬其頓共和國提出有利的領土訴求。這種訴求不可能實現，一則有赫爾辛基最後議定書的約束，再則有歐體／盟或北約的監視。探究希臘真正的動機：一是將泛希臘與古代馬其頓的記實直接串連起來，如此可適切地保衛民族遺產的集體權利；一是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馬其頓吶喊要合併希臘馬其頓之重現，堅持表示希臘馬其頓是希臘國家不可分割的部份；更重要的是要世人認知，馬其頓只有一個，那就是希臘馬其頓，依此邏輯推論，除了希臘馬其頓外，在巴爾幹沒有一個地區或人種可以跟古代馬其頓王國相關聯或同為一屬種，除了希臘人之外，沒有一個民族或族群可以將馬其頓這個名字用在「文化種族」（cultural-ethnic）或「地理區域名稱」（geographic-regional appellation）上。一個斯拉夫

國家，擅自僭取「馬其頓」這個名字作為一新獨立國家正式國號，對希臘人來講，是一件歷史荒謬不合理的大事。希臘民族主義者獨佔「馬其頓」這個名詞之心態，甚至對其本國溫和派者提出以「斯拉夫馬其頓」(slav-Macedonia)或「瓦達馬其頓」的名稱或複合名字來調和希、馬間的糾葛，都被罵為民族叛徒，希臘民族主義者主張以斯科普耶(Skopje)為官方及俗語之國名，其人民叫斯科普耶人(Skopians)，就是將「馬其頓問題」淨化成「斯科普亞諾」化(Skopiano)(Kyrkos, 1993: 85)。

事實上，希臘以只有一個馬其頓的「馬其頓論」(Macedonologues)來對抗「馬其頓主義」，根本就站不住腳，希臘學術界以曲解歷史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嘗試建立一個主題：在希臘馬其頓這塊土地之外的人、民族、國家乃至地理名稱，使用馬其頓這個名字或它的淵源關係字(如複合字)，都是沒有其歷史的正當性。顯然他們故意掩飾史實：(一)在鄂圖曼帝國時代，馬其頓這個地域名詞，含蓋了今天的希臘愛琴馬其頓，保加利亞皮林馬其頓及現在的馬其頓共和國(即瓦達馬其頓)，並非只專指今日之希臘馬其頓；(二)近代，或正確地說，自十九世紀起就浮現了「馬其頓問題」，如「馬其頓內部革命組織」的成立，就出現了馬其頓民族主義，特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就有馬其頓民族解放組織的出現，且與狄托南斯拉夫民族解放組織聯合，解放了現今的馬其頓共和國，這是世人所共同認知的事實，相信希臘的歷史學家，政治人物也接受此史實。

當然，斯科普耶政府及其廣泛的支持者喊出自一九四〇年代以來第一次的反擊口號：「馬其頓再統一」(reunification of Macedonia)，「索隆是我們的」(Solun is ours, 按：Solun 即是現在希臘的 Thessaloniki 港)。「馬其頓內部革命組織-馬其頓民族統一民主黨」(IMRO-DPMNE/VMRO-DPMNI)，這個民族主義政黨於一九九〇年一月成立，成為馬其頓推動民族主義的原動力。它捨去其前身「馬其頓內部革命組織」(IMRO)那種恐怖組織的型態及保加利亞取向，其黨綱的政治目標是先走向獨立，再求三個馬其頓地區之統一。一九九〇年後期馬其頓社會主義共和國第一次舉行多政黨大選中，該黨在國會的一百二十席位中獲得三十七個席次，是國會中最大黨，其所表現的民族主義，完全是以激情煽動化取勝(Poulton, 1995: 172-175; Lagani, 1999: 296-299)。

希臘政府並未完全隨民間起舞，總理米索塔基斯(Constantine Mitsotakis)和外長薩瑪拉斯(Andonis Samaras)循傳統的對外政策：與南斯拉夫聯邦維持良好關係，並努力

與美國及歐體 / 盟內多數大國維持協商關係。當南斯拉夫聯邦結構解體而出現無法逆轉的情勢時，雅典政府改變只注意前南斯拉夫內部情勢變化，轉而尋求國際確實保証巴爾幹諸國外部的疆界不變。當時，除德國與義大利外，歐體 / 盟的多數國家對巴爾幹爭端之錯綜複雜，大多漠不關心，希臘政府只好轉向到貝爾格勒 (Belgrade) 和索非亞 (Sofia)，對馬其頓社會主義共和國之問題，共同尋求一解決辦法，因為希臘最擔心的是如果馬其頓共和國爆發敵對戰爭，難民會湧向希臘 (Wallden, 1994: 29-30; 73-78)。希臘最後發現轉向貝爾格勒和索非亞，等於是緣木求魚，為什麼呢？

保加利亞見到南斯拉夫聯邦解體，其在巴爾幹的傳統宿敵塞爾維亞陷入戰爭漩渦，塞爾維亞喪失它在巴爾幹的優勢地位，在塞爾維亞無力控制保加利亞所認定的「三個歷史性的保加利亞領土」(three historic Bulgarian lands) 之一的瓦達馬其頓 (即馬其頓社會主義共和國) 的情勢下，保加利亞當然無心為貝爾格勒當局作調停，也不支持希臘的觀點：維持塞爾維亞為區域霸權的結構。因為保加利亞對長久被疏遠的馬其頓人民及領土，具有無止境的懷舊之情，這是數十年冬蟄的大保加利亞主義再度復活的大好機會 (Lagani, 1999: 302-303)。

希臘政府認為保加利亞無力影響馬其頓的發展；另一方面，希臘認定國際社會，特別是歐體 / 盟內的會員國，會接納希臘的觀點與立場，更何況那時歐體 / 盟完全陶醉在「歐洲團結」(European Solidarity) 的馬斯垂克 (Maastrich) 愉悅期中，不甚在意馬其頓問題。於是促成希臘選擇米勒塞維奇 (Slobodan Milosevic) 所領導的南聯盟，想借助塞爾維亞制止斯科普耶統一民族主義之復活 (Wallden, 1994: 29-30)。在整個盤算上，希臘的評估與期望失算。保加利亞是無力干預馬其頓，但這絕不表示保加利亞對馬其頓之發展以及希臘在這個問題上對塞爾維亞的親善政策漠不關心，更令雅典感到痛苦且又震驚是：米勒塞維奇為達成壓制北方戰爭及科索沃動亂的優先政策，乃自馬其頓撤軍，這等於希臘為自己招來一個自貝爾格勒解放出來而渾身芒刺的北方鄰國：馬其頓。

伍、希臘對馬其頓承認之外交戰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歐體 / 盟外長發表有關南斯拉夫聯邦之宣言，這是馬其頓被承認問題的轉捩點，就是為前馬其頓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國際承認勾勒出預先必

備條件的架構，此項承認在相當程度上受到希臘的反對，希臘在外長會議上要求〔馬其頓〕「憲法及政治上的保證：〔申請國〕對鄰國〔希臘〕無領土之要求及無對鄰國作有敵意之宣傳活動，包含沒有領土訴求的命名／名稱之使用」（Valinakis & Dalis, 1996: 51-52）。幾個星期後，斯科普耶政府回應希臘之要求，對憲法作了少許修正，但迴避了新國家名字的核心問題。巴丁特仲裁委員會提出一有利於承認的建議，但希臘認定該建議的承諾不足，於是歐體／盟要求輪值主席葡萄牙外長皮內羅（S. Pineiro）向雙方磋商，俾以找出適切的解決方法。皮內羅在與馬、希兩國洽商後，根據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外長宣言為基礎，起草了兩份文件。第一份草案敘述「不得作領土要求」的保證，第二份文件則為「不得進行敵意宣傳」的保證，在國家命名上，皮內羅僅口頭上建議以「新馬其頓」(New Macedonia)定名，猶如 New Zealand, New Calodonia, New Guinea 之取名一樣。前南斯拉夫馬其頓共和國對不作領土要求及不作敵意宣傳表示同意，但對國名則保留未予以承諾，可能是要等待希臘反應之後再另作決定。希臘外長薩瑪拉斯暫時接受這兩份草案，但拒絕波內羅的國名建議（Valinakis & Dalis, 1996: 87-90; Veremis, 1995: 95），因為薩瑪拉斯採取強硬不妥協不讓步（maximalist）的立場：不能使用 Macedonia 這個字及 Macedonia 衍生之相關字。隨後前南斯拉夫北部情勢升高，歐體／盟輪值主席葡萄牙外長為表示歐體／盟與希臘團結一致，在一九九二年五月二日於吉瑪拉斯（Gimaraes）歐體／盟外長會議上宣佈，他們準備對前馬其頓社會主義共和國在「所有〔歐體〕關係夥伴所能接受的名字下，承認其為一獨立主權國」，這等於接受希臘對馬其頓國家的名字使用條件或立場（Valinakis & Dalis, 1996: 94）。隨後兩個月，美國逼迫歐體／盟加速承認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但卻未提及馬其頓。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六、二十七日歐體／盟國家首長在里斯本（Lisbon）集會，更進一步辯論希臘請求案，他們反覆陳述要承認這個新國，不過這次明確朝向以「不含有馬其頓的名字下」承認之（Valinakis & Dalis, 1996: 97-99）。這種措辭超出了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外長宣言，那就是特別排除了「馬其頓」這個字為國號，後來揭露：希臘總理私下坦然同意此如決議的命名適合國際使用（Valinakis & Dalis, 1996: 97-99）。

表面上，希臘在勝算上已在歐體／盟的各種會議中取得了其所需，然而馬其頓總統格里哥羅夫根本就拒絕遵守歐體／盟的裁定，因而造成了他的國家之被承認遲延了一年多。最後，格里哥羅夫採取繞道方式，於一九九三年一月向聯合國申請會員國地位，同

年四月七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第八一七號決議：(一)新會員國國號名字爭議未解決之前，暫以「前南斯拉夫馬其頓共和國」(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FYROM)之臨時國號入會；(二)新會員國的「渥吉納太陽」(Vergina Sun)會籍旗，帶佩有古代馬其頓徽記，希臘有異議，暫不在聯合國總部懸掛。安理會為其上述之決議案所作的辯護是：為「維持此地域的和平與良好睦鄰關係的利益」；也就是說聯合國對希臘主張的讓步，乃鑑於前南斯拉夫馬其頓共和國「憲法上」的國名，可能會造成此地區國家民族間的和平與睦鄰負面的影響 (Valinakis & Dalis, 1996: 147-148; 洪茂雄, 1993: 78)

隨後的幾個月，聯合國特使歐文 (Lord Owen) 和萬斯 (Cyrus Vance)，在美國支持下，聯合國接替了歐體 / 盟調停任務。這兩位調停人在紐約與希、馬雙方代表徹底磋商，提出一雙方主要考慮的綜合草約，希望建議以「Nova Makedonija」(按：接受葡萄牙外長 Pineiro 之建議，採斯拉夫文命名)，以求突破雙方之瓶頸 (Papaconstantinou, 1994: 243-412)。

歐體 / 盟領袖在吉瑪拉斯和里斯本的會議明確決定，固然是希臘表面上的勝利，但往深度看，這些決議絕不是為希臘在與斯科普耶的爭執上予以充分的背書。里斯本會議之後，希臘總理米索塔基斯一因年事已高，再因歐體 / 盟內諸事順利，所以未再積極經營與歐體 / 盟內友好的夥伴的支持張力，俾以繼續作為與斯科普耶周旋談判之後盾。一九九二年夏希臘政府向斯科普耶施壓，這時前南斯拉夫境內的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情勢越來越惡劣，馬其頓總統格里哥羅夫呼籲歐體 / 盟及其他國家對他的國家給予立即承認，如是以穩定此地域和平及堵止南斯拉夫內戰擴延到南方而影響歐洲之安全。

克羅埃西亞的情勢發展以及在波士尼亞新開啟了戰場，使得歐體 / 盟的強權與美國被迫積極捲入干預，在圍築塞爾維亞的「封鎖警戒線」(cordon sanitaire) 過程中，馬其頓成為強權制伏米塞羅維奇的一顆有利棋子。如此一來，這個弱小的內陸國在對敵對戰區上具有曇花一現的戰略地位價值，在這種危機時刻 (一九九二年前半年)，歐體 / 盟在追求巴爾幹局勢穩定，其策略開始從希臘轉移到馬其頓。

一九九三年五月，希臘總理米索塔基斯接獲聯合國調停人萬斯及歐文有關希、馬間包括國名問題妥協草約版本時，他的政府與新任外長巴巴康斯坦第諾 (Michalis Papaconstantinou, 在紐約談判之希臘代表) 已準備對不妥協不讓步的戰線讓步，討論複

合字的國名⁽³⁾。然而在國內的壓力下，新民主黨（New Democracy, ND）的米索塔基斯被迫下台，十月大選，政權再度回到泛希臘社會主義黨（Panhellenic Socialist Party, PASOK）愛國派領袖巴班德羅（Andreas Papandreu）手中。巴班德羅執政後，外長巴波里阿斯（Karolos Papoulias）宣佈恢復堅守不妥協不讓步的立場，可是他們兩人不久發現，在聯合國主持下的談判，除非馬其頓總統格里哥羅夫放棄不妥協的立場，並遵守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歐體／盟外長宣言的三原則，否則根本就沒有多大的希望阻止馬國不用「馬其頓」為國名（Valinakis & Dalis, 1996: 175-176）。相對的，馬其頓卻獲取大部份外國政府，包括歐體／盟成員國及美國支持安理會的決議：暫以前南斯拉夫馬其頓共和國入會，除承認馬其頓外，並同意委託聯合國調停。這時的希臘遭到嚴重挫折而重新評估對馬其頓的政策，並採譴責方式，指責盟國拋棄希臘，在塞薩隆尼基、雅典及各大城市發動大規模示威運動，巴班德羅利用群眾情緒，譴責外國，迴避他在事件中的角色責任（Mouzelis, 1993: 44; 46-47; 56）。

希臘為了報復馬其頓，一方面在一九九四年二月對前南斯拉夫馬其頓共和國實施除糧食與醫療藥物外的全面禁運，以反制的對策對付格里哥羅夫之不妥協。這是一賭注的戰略；一方面不斷向國際社會申辯，並非將新獨立的弱小新鄰國視為敵人，而只是為保存它的歷史遺產作合法的保護，目的在動亂的巴爾幹地區確保長期和平睦鄰關係。可是這項禁運政策，卻凸顯了國際社會對希臘的一項新認知：頑強且含有強國逼脅弱國之兇勢（Veremis, 1995: 90-92; Woodward, 1995: 387），同時更激發馬其頓頑強不屈。

巴班德羅一面煽動民族情緒，一面於一九九三年春派密使與萬斯、歐文談判，諷刺的是還是援用前政府之版本草約。最令希臘受到衝擊而又懊惱的是錯估禁運：原本是要制伏馬其頓的手段政策，卻成了希臘本身貿易、經濟的障礙 喪失進入東歐及巴爾幹新市場，不得不再迅速地評估政策，包括應否取消禁運政策（Mouzelis, 1995: 53-70）。

一九九四年三月，萬斯主動與希臘展開新回合談判，非專為協商希臘取消禁運，而是因為希臘政府有默認沒有先決條件的談判基礎，僅修改一九九三年萬斯-歐文版本，花了一年半的時間磋商，一九九五年九月雙方在紐約簽訂「臨時協定」（Interim Agreement）：

一、希臘以「前南斯拉夫馬其頓共和國」之臨時名稱承認馬其頓。

二、希臘取消對馬其頓之禁運。

三、斯科普耶同意更換國旗，不用古希臘馬其頓之徽記，馬其頓憲法中之條款，例如具有助長挑撥民族統一主義訴求條款、正當化干預希臘國內事務條款以及藉口關心希臘馬其頓少數民族地位與權利等條款，得接受希臘觀點的解釋而另定之。

三、兩國保證雙方經濟合作關係。

四、在兩國首都設立大使級「聯絡辦事處」(Liaison Office)，建立準外交關係。

雙方成功地解除了四年來爭執不休的額外負荷——希臘的禁運，及馬其頓的國旗，而走進關係正常化的睦鄰關係。只剩下國家名稱，希臘外長巴波里阿斯聲稱：這個問題將很快獲得解決（Rozakis, 1996: 77）。

一九九六年一月巴班德羅因老邁健康惡化，辭去總理之職，由西米梯斯（Kostas Simitis）接任，外長為班格洛斯（Thodoros Pangalos）。班格洛斯於一九九七年二月二日國會演說中，支持「臨時協定」，同時說明政府會朝向妥協方向努力。

儘管安全理事會的決議及「臨時協定」的相關指示：雙方應尋求國號名稱之解決，可是格里哥羅夫總統善用有利情勢。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六年的三年間，一面迎合聯合國的談判，一面堅持在不讓步的情況下，藉由追求兩國經濟強力合作互利的關係及邊境開放兩國人民自由進出，讓國家名稱在慢慢淡化中取得解決。一九九七年夏天，前南斯拉夫馬其頓共和國向萬斯提出有關國名官正式立場，十二月，馬其頓外長哈濟斯基（Hadziski）宣佈：他的政府打算要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以憲法上的國家名稱入會。

希臘方面，不讓步不妥協政策的極端支持者，已開始瞭解到格里哥羅夫總統「不妥協」(intransigent) 的標誌，可以不花什麼代價就可取得國家名稱的正當化。因此，在戴頓協議簽訂前夕，希臘已充分瞭解到將喪失解決問題的機會與籌碼，因巴爾幹情勢不利於希臘，美國急著欲撫平南斯拉夫北方波士尼亞內戰，緊急干預調停雅典與斯科普耶間的爭端，希臘總理採取所謂「小整批交易」(small package) 方式的解決方案：取得格里哥羅夫總統同意規避國家名稱問題，求取爭端實質的解決。當希、馬雙方已解決所有的問題而只剩國號，格里哥羅夫在無任何問題的牽絆下，直接向聯合國訴求以憲法上之「正名」——馬其頓共和國——入會，贏得這一場國家承認的外交戰。

陸、阿爾巴尼亞

阿爾巴尼亞對馬其頓這個新國家的獨立深表歡迎，主要的原因是阿爾巴尼亞將馬其頓看作它平衡塞爾維亞的籌碼。阿爾巴尼亞政府曾向馬其頓提及馬國境內的阿爾巴尼亞少數民族人權問題，這是因為塞爾維亞統治下的科索沃阿族人，其處境極為惡劣，因而關心到馬其頓境內的阿族人，不過馬其頓境內阿族人，尚未到達要脫離馬其頓的地步（洪茂雄，1999：10；蘇武，1999：42），他們曾要求阿族人居住地區能給予自治，可是馬其頓政府未同意，遂產生阿族人以游擊戰方式反抗馬其頓政府。因此，馬其頓境內的阿爾巴尼亞人，將可能是馬國未來不安定的因素。

阿爾巴尼亞在狄托統治前南斯拉夫時期，雙方維持相當親密的關係，可是到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後，阿爾巴尼亞民族主義逐漸上升，特別是接近阿爾巴尼亞的科索沃及馬其頓西、北部地區，住有佔絕對多數的阿族人，一九九二年一月，科索沃、馬其頓西、北部地區的阿族人自行舉行公民投票，壓倒勢同意阿爾巴尼亞人自治（蔡佳芳，2001：17）⁽⁴⁾。不過阿爾巴尼亞與馬其頓間的經貿關係不斷地成長，這將有助於雙方關係之改善。

另外，就馬其頓在巴爾幹區域的地位層面來看，阿爾巴尼亞政府會盡量與馬其頓維持良好關係，因為假定阿爾巴尼亞為科索沃問題而與塞爾維亞發展成敵對關係的話，這必定會造成地拉納（Tirana）政府對其軍隊再進行裝備。如此一來，馬其頓對阿爾巴尼亞及塞爾維亞均具有重要戰略地位。因此，如果地拉納政府支持馬國境內阿族人政黨，那麼這不僅使馬國政府與境內阿族人關係交惡，也與阿爾巴尼亞之關係陷入絕境，促使馬其頓傾向塞爾維亞而產生對阿國不利；再說，此會造成巴爾幹地域的不安，歐體／盟及北約也不許其越界滋事，從這一方面看，馬其頓將不是阿爾巴尼亞的核心問題，維持良好關係則有利阿國。馬其頓如何公正處理境內阿族少數民族問題，是馬國除經濟之外，最重要的課題。

阿族人抱怨「差別待遇」，要求與馬其頓人一樣，構成國家的主體民族地位，要求阿爾巴尼亞語也列為官方語言，允許成立阿族語之大、中、小學，這些主張被馬其頓人質疑他們對國家的忠誠，不肯修憲，增訂阿族人種族集體權利條款；另外，馬國政府存有一種將被他族壓制的隱憂，主因是阿族人是歐洲生育率最高的民族，人口專家

估計，到三十、四十年後，阿族人將成為馬其頓多數民族 (Perry, 1992: 17)，更何況阿族的激進派擁有武力之存在。因此，馬其頓雖已獨立且被承認，但我們可以說馬其頓內部的安全與繁榮，最大的威脅來自境內的阿爾巴尼亞人，舉例來說，二〇〇一年二月南聯盟 / 塞爾維亞與馬其頓簽訂邊界協定，引起科索沃阿族人之不滿，製造事端，並把衝突推進馬國境內，引發馬國政府軍強制鎮壓阿族游擊隊，同時不得不屢向聯合國、北約求援，要求制止境內「恐怖主義活動」(蔡佳芳，2001：17)，阿爾巴尼亞與馬其頓的關係，將繫於馬國境內阿族人之地位。

柒、保加利亞

歷史的傳統上，保加利亞一直是最直接謀取佔據馬其頓領土——包括愛琴馬其頓、瓦達馬其頓及皮林馬其頓——的強權。十九世紀末保加利亞強將馬其頓人遣居索非亞，造成今天保加利亞的許多城鎮幾乎全是馬其頓血統。因此，基本上，馬其頓語在保加利亞是一支方語，而保加利亞一直否認馬其頓民族及言語之存在 (Drezov, 2001: 51)。今天馬其頓新國家之領土，不是保加利亞十九世紀民族統一主義者所欲求的領土，那時民族統一主義者所欲求的領土包括愛琴馬其頓及瓦達馬其頓。如果保加利亞今天要求擁有這一大片領土，勢將大大改變目前保加利亞的政治、經濟的潛力，但這種擴張不只傷害到希臘及塞爾維亞，也與歐盟、北約為敵。因此，保加利亞不敢而北約也不許。

馬其頓自稱為古代馬其頓帝國之後裔，目前馬其頓最大政黨「馬其頓內部革命組織-馬其頓民族統一民主黨」(VMRO-DPMNE)制訂光復這些領土的黨綱，但在希臘之要求，歐盟及美國壓力下，馬其頓憲法已有不向鄰國領土訴求條款之增訂的約束，其黨綱之實現已不可能。

除開上述外交層面之外，希臘人在民族心理上或許多多少少存在某種陰影，因為希臘人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保加利亞佔領希臘馬其頓的痛苦記憶，仍存在於他們的心中，可是馬其頓的獨立可能影響到希臘馬其頓的不安，希臘不得不與保加利亞加強關係，不願節外生枝，俾以全力周旋馬其頓；馬其頓在第二次大戰中及之前均曾被保加利亞佔領過。因此，不管有多大多錯綜複雜的環境壓力存在，保衛領土勢必受到馬國人民

全力支持。可是，保加利亞是第一個承認馬其頓這個新國家，無疑地，保加利亞欲將自己涉入馬其頓事務中，俾以增加巴爾幹區域的影響力，此舉行動被鄰國或外界視為先求與馬其頓經濟上的整合，然後再求邦聯的浮現（Pettifer, 2001: 26）。這種看法，在歐體／盟及北約東擴的情勢下，似乎不易實現，而馬國也可能不願意。

捌、結論

今天馬其頓人明確主張：自亞歷山大大帝以來，「馬其頓」這個名字一直表示著「他們的土地」，這種說法是否正確則頗有疑問。從歷史的追溯來看，到十九世紀以前，住在古代馬其頓領土上或鄰近土地上的族群，差不多有一千年的時間，未曾被稱為「馬其頓人」。在拜占庭時期，馬其頓只是一地理名詞，它包括現在的色雷斯，而今天的馬其頓共和國是拜占庭帝國保加利亞省的核心區，到十九世紀後期，鄂圖曼土耳其人甚至不知道他們所佔領的地方有個名叫馬其頓。文藝復興以後，為探索希臘文化，馬其頓這個名字，常被西方旅行者、地圖繪製者及政治人物意指為古代馬其頓帝國，十九世紀初，希臘首先再採用這個名字作為地方行政區的名字。

許多馬其頓的史料編纂者（historiographers），自認為是「斯拉夫馬其頓人」（Slav Macedonians），是把自己與第六、第七世紀移入的斯拉夫人連接在一起，不過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起，「馬其頓內部革命組織」就把他們自己當成是馬其頓種族／民族的組織，於是馬其頓這個歷史名詞或地理名詞，這時被賦上了政治及民族意識。他們自稱為馬其頓民族，是一獨立的民族，與任何國家任何民族無關，只因鄰國懷大保加利亞主義、大塞爾維亞主義、大阿爾巴尼亞主義、大希臘主義的兼併野心，及馬其頓懷光復古代馬其頓領土的企圖，才會引發糾葛。

其次，巴爾幹國家——希臘、保加利亞、塞爾維亞、阿爾巴尼亞或馬其頓本身，對馬其頓的認同上各有不同的論點，但有一項共同點，那就是彼此都不承認對方所提的歷史變遷對馬其頓這塊土地的屬性物——人民、土地，彼此把「道德」（moral）

明辨是非——這個名詞的評價排斥在外，例如，如果認為古代馬其頓人是希臘人，那麼無論是現在或未來，沒有人有使用馬其頓這個名詞的權利，如果馬其頓人在十九世紀中期後被認定是保加利亞人，那麼稱斯拉夫馬其頓人也不為過，因保加利亞人也是斯拉夫保加利亞人。因此，在辯論馬其頓人屬那一國人，甚至是什麼民族時，就成

了政治的含義，那就錯綜複雜了，甚至引發民族主義或國家的對立，至此就演化成政治人物鞏固權力的手段了。

第三，自一八七八年俄土戰爭結束起到今天為止，回顧巴爾幹這一百三十年的任何危機，包括第一、第二次巴爾幹戰爭，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乃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南斯拉夫聯邦分裂的危機，均有列強強力干預，方能暫時擺平局勢。令人懷疑如果未來巴爾幹再有危機發生，將循強權干預的歷史軌跡模式演變下去。

最後，馬其頓這個老問題雖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再度掀起，可是馬其頓總統格里哥羅夫，在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五日歐體／盟在不承認他的新國家之後，他就改變他的國家外交發展方向，暫時避開歐體／盟，轉向到聯合國尋求國家承認的突破，把希臘在歐體／盟的立足點推至聯合國去懸空，以遠交近攻戰術，逼希臘屈服，顛覆弱國無外交的論調，馬其頓共和國的四面鄰國由「四狼」變成「四羔羊」，和睦相處，爾後的馬其頓的問題只在解決經濟與阿爾巴尼亞少數民族，力圖國家之穩定繁榮。

註釋：

- (1) 馬其頓內部革命組織後期分兩派：一派傾向與「最高委員會」密切合作，透過此管道與保加利亞沙皇與戰爭署（War Office）接觸，此派表面上追求馬其頓的自治或獨立，實際上的目的在為保加利亞併吞馬其頓作掩護，在意識條件上，它後來發展成極端民族主義的右派，是共產黨的死敵，同時也是左派保加利亞農民運動的宿敵；另一派真正傾向馬其頓的自治或獨立，主張馬其頓境內各民族 斯拉夫人、土耳其人、阿爾巴尼亞人、希臘人 皆兄弟，與「最高委員會」及保加利亞戰爭署仍維持某種程度之接觸，因為此派之財政與武器庶幾來自保加利亞之故。所以，其獨立運動受到極大的限制，這一派後來發展成左派運動。第一次大戰結束後，其成員不是成為「聯邦主義者」 主張在南部斯拉夫聯邦（South Slav Federation）內為一自治的馬其頓，就是變成「共產主義者」（Georgevitch, 1978, chap. III）。
- (2) 一九八〇年代末期，前南斯拉夫聯邦出現分裂跡象，史洛凡尼亞和克羅埃西亞于一九九一年六月宣佈脫離南斯拉夫聯邦而獨立，波士尼亞 赫塞哥維納（Boshia-Herzegovina, 簡稱波士尼亞）也蠢蠢欲動，走向獨立。可是波士尼亞人口結構分三個主要部份：回教徒 43%，克羅埃西亞裔 17%，塞爾維亞族 31%，回、克聯合起來控制議會，一九九一年十月宣佈獨立，一九九二年二月公民投票決定脫離南聯邦。波士尼亞之塞族心向南聯邦之主軸國 塞爾維亞共和國，反對獨立。塞族部隊於一九九二年六月發動內戰，搶先佔有波士尼亞領土之 71%，由於殺戮殘酷，塞族不肯讓步，聯合國、歐洲共同體調停無效，後來演變成三族相互混打雜殺局面。在國際壓力下，經多方調停：回、克兩族佔波士尼亞 51% 土地組一聯邦（the Federation），塞族佔 49% 土地為一共和國（Republika Srpska），再共組邦聯，唯一難題，是塞族不願吐出所佔之土地。再經美國多方協調，終於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美國俄亥俄州之 Dayton 鎮獲致和平協議：同意進行族裔間的土地互換，

分割四年的塞拉耶佛 (Sarajevo) 終於一九九六年三月恢復全國統一，九月十四日舉行選舉，成立三族各派一人的國家主席團，並選出國會及塞族議會、回克聯邦議會，以實現同國各族分居分治之和平理想 (弘杉，2000：279-310；馬細譜，1999：368-412)。

- (3) Memorandum of Greece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FYROM for Admission to the UN. New York, 25. 1. 1993 (Athens: ELIAMP). 10pp.
- (4) 根據一九九一年馬其頓人口普查的結果，馬其頓總人口為 2,033,964 人，其中三分之二 (1,314,000) 是馬其頓人，而阿爾巴尼亞人為 427,313 人，佔總人口 21%。阿族政治領袖強烈質疑此數字，他們說阿族人的口比例佔馬其頓總人口的 35% 甚至 40%，他們解釋的理由是很多阿族人杯葛人口普查而拒查報；第二，普查單位為馬其頓人組成，巧妙地隱藏阿族人數。馬其頓西、北部與阿爾巴尼亞、科索沃為鄰，因而馬其頓的阿族人要自馬其頓分離出去，割地給大阿爾巴尼亞。此次公民投票係由民主繁榮黨 (the Party for Democratic Prosperity, PDP) 主持，事後其黨主席哈利利 (Nevzat Halili) 解釋此次投票結果：「我們藉此告知全世界，國際社會對馬其頓國家之承認過早，因為在這個國家我們少數民族遭到踐踏、蹂躪 (Die Tageszeitung [Berlin], 13 January, 1992)，言下之義馬其頓應由兩主體民族共治。

參考文獻

王萬里 (2002)。《台灣與歐盟》，台北：五南出版社。

弘杉 (2000)。《巴爾幹百年風雲》。北京：知識出版社。

成林、周健編著 (1994)。《希臘、阿爾巴尼亞、馬其頓》。北京：軍事文藝出版社。

洪茂雄 (1993)。馬其頓的獨立和加入聯合國問題，《問題與研究》，32 (6)：7-9。

洪茂雄 (1999)。後共產主義時期馬其頓的政經發展情勢，《問題與研究》，88 (5)：1-14。

馬細譜 (1999)。《巴爾幹紛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蔡佳芳 (2001)。《台馬建交模式——從台灣與馬其頓的邦交關係來看我國經貿外交策略》，

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鍾志明 (2002)。歐洲議會友我決議案之意義，論文發表於「歐洲聯盟研究論壇」學術

討論會，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

謝福助 (1995)。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南斯拉夫與蘇聯之關係研究 (1939-1945)，《淡江學報》，34：834-847。

蘇武 (1999)。從南斯拉夫的分裂看馬其頓與科索沃問題，《外交部通訊》，22(10)：34-43。

Alexandris, A. (1994). Turkey's present Balkan policy. In T. Veremids (Ed.), *The Balkans: From bipolarism to the new era* (pp. 850-863). Athens: Otto Harrasowitz.

Barker, E. (2001). The origin of the Macedonia dispute. In J. Pettifer (Ed.), *The new Macedonia question* (pp. 3-14). London: Palgrave.

Bazhdaroff, G. (1926). *The Macedonia question*. Sofia: Sofia University Press.

Bogoev, K., & Uzunov, N. (1996). Perspectives of Republic of Macedonia. *Balkan Forum*, 1, 63-113.

Cviic, C (1991). *Remaking the Balkans*. London: RIIA.

Drezov, K. (2001). Macedonia identity: An overview of the major claims. In J. Pettifer (Ed.), *The new Macedonia question* (pp. 51-53). London: Palgrave.

Dzunov, T. (1994). Succession of states, citizenship and new legal order of the Republic of Macedonia. *Balkan Forum*, 4, 199-230.

Frase, J. M. (1993). Yugoslavia-What went wrong? In J. Kella (Ed.), *Proceedings of the Norman Pater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pp. 4-10). New York: Martin's Press.

Georgevitch, T. R. (1978). *Macedonia*. London: Allen & Unwin.

Isakovic, Z. (1996). Macedonia and security in the Balkans. *CSS Survey*, XXII, 1-11.

Kofos, E. (1991). Greece and the Balkans in the 70s and 80s. In S. Vryonis (Ed.), *Greece on the road to democracy: From the Junta to PASOK, 1974-1986* (pp. 97-122). New York: A. Caratzas Publisher.

Kofos, E. (1993). *National and communism in Macedonia: Civil conflict, politics of mutation,*

-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A. Caratzas Publisher.
- Kraph, J. (1996). The ideals of Ilinden: Uses of memory and nationalism in socialist Macedonia. In J. S. Micgiel (Ed.), *Stat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East Central Europ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pp. 42-50). New York: New York Institute on East Central Europe, Columbia University.
- Kyrkos, L. (1993). *The dead-end step of nationalism: Some thoughts about the Macedonia issue*. Athens: Damad.
- Lagani, E. (1999). The Macedonian questio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Koliophonlos & Hasiotis (E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Macedonia (Vol. II)* (pp. 296-303). London: Palgrave.
- Marinkovic, B. (1996, April 19). A hot potato from Athens. *Interviu*, p. 5A .
- Mouzelis, N. (1993). Ethikismos. *To Vima*, 16 March, 1993. (Reprinted from *O Ethnikismos stin Ysteri Anaptyxi [Nationalism in later development]*, pp. 44-70, by N Mouzelis, 1993, Athens: ELIAMEP.)
- Naum, S. (1997). *Beyond borders: Remarking cultural identities in the New East and Central Europ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Papaconstantinou, M. (1994). *The Diary of a politician: The Skopje Entanglement*. Athens: ELIAMEP.
- Papathemelis, M. (1990). 'Kathimerin' current politics and future prospects. Thessaloniki: Barbounakis.
- Papaconstantinou, M. (1990). Statement by the head of the Greek delegation, CSCE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dimension (Copenhagen, June 5-29, 1990). *Yearbook 1990 Southeastern Europe* (pp. 353-360). Athens: ELIAMEP.
- Perry, D. M. (1992). The Republic of Macedonia and odds for survival. *Radio free Europe-research report*, 46, 12-19.
- Pettifer, J. (2001). The new Macedonian question. In J. Pettifer (Ed.), *The new Macedonian question* (pp. 15-27). London: Palgrave.
- Poulton, H. (1995). *Who are the Macedonian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Reuter, J. (2001). Policy and economy in Macedonia. In J. Pettifer (Ed.), *The new Macedonian*

- question (pp. 30-38). London: Palgrave.
- Rozakis, C. (1996). Politikes Kai Nomikes Diastaseis tis Metavatikis Symfonias tis Neas Yorkis Metaxy Elladas Kai PGDM [Political and legal dimensions of the interim agreement between Greece and FYROM] (text of agreement annexed). Athens: Sideris.
- Valinakis, Y. (1994). Greece's security in the Post-War era. Ebenhausen: Stiftung Wissenschaft and Politik.
- Valinakis, Y., & Dalis, S. (Eds). (1996). The Skopje question: Official documents, 1990-1996 (2nd ed.). Athens: ELIAMEP.
- Veremids, T. (1995). Greece's Balkan entanglement. Athens: ELIAMEP.
- Wallden, S. (1994). The Macedonian question and the Balkans: The dead-end course of Greek Policy. Athens: ELIAMEP.
- Woodward, S. (1995). Balkan tragedy.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